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四）

“华夏文摘”增刊等，刊载过不少文革往事，其中也有一部份涉及红卫兵的背景、动机、暴行追忆等。就我所见，作者大都是红卫兵、被红卫兵排挤的同学，以及他们同龄的旁观者。作家郑义作为1966年清华附中在校高年级学生，谈到了红卫兵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见本期下文——编注）。但是他只有一个学生因出身不好受排挤的感受，这种局限使他对所谓红卫兵“杀向社会，扫荡污泥浊水”阶段著墨不多；而且也只看到此辈“缺德少才，想出人头地又没有本钱”，只好用血统出身标榜自己，搞点子甚么红卫兵。事实上“缺德少才，缺乏本钱”是中国党、政、军几十年所谓土八路和洋学生，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矛盾的根本原因，这里面根本没有甚么世界观的差异、改造得好与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在扫四旧中没有亲

身被扫，没有荣列被镇压、被专政的对象，是很容易忽略也很难亲眼见到，“贪婪”、“对国外物质生活的病态羡慕”，也是驱使红卫兵疯狂的主要因素。特别在扫四旧后期，这些可说是主要动机。那一段血腥历史，不幸在上述很多文章中，读来颇像“少年趣事”或“下乡采风”之类。近来更有文章冷眼旁观，把红卫兵暴行当做“一种思潮”来研究。我想把它当做一种“思潮”实在是过份抬举它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希特勒的SS冲锋队，有人把它作为历史来研究，还没有听说尊为“思潮”来研究的。在此谈谈我自己在1966年秋天以后的经历，也许有助视听。

◇ 与清华附中为邻

1966年在北京像我这类平民百姓，在山雨欲来的政治空气中，心中惶然不知何事将至、何时将至。虽耳闻清华附中出了甚么红卫兵，又被他老人家推崇备至，自己实际上并不清楚是甚么。加之与该校素无瓜葛，仅住家在成府，相距不远而已，更想不到会在治安机关、街道干部穿引下横祸加身。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不久，还未吃饭，就来了三个手执电线编成的鞭子，穿不合身旧军装的学生，二话不说进门就打，还逼我自报出身。我据实自报为革命军人，反遭毒打。他们翻箱倒柜，到底想找甚么我也不知道，把一切纸张文件摊了一桌子，逐张审阅。后来他们自己互相嘀咕了一阵，把一堆东野、四野、广州军区的证件证明推向我面前，问我这些证明是真还是假。我没好气，教他们回去问他们家长去，并要他们自报家门。气焰最嚣张，像没吃饱饭样子的，是熊向辉的儿子熊某（熊刚，见下文——编注），另一个慌了神，赶忙说我爸爸是邝任农（曾任中国民航局长——编注），我叫邝某某。第三个最贼，想溜，邝某某说他是张某某。当时我虽额头、口角鲜血直流，但想他们都是孩子就算了。

不料第三天晚上又来了一群，还开来一辆三轮卡车，其中只有一个肯自报家门，安子文的儿子安某某，他看了桌子上仍堆著的证明，就要同夥回去，但却没有人肯听，席卷进口细软装车扬长而去。清华附中开三轮卡车的司机叫李玉华，家住蓝旗，以前来借过工具，有点头之交。第二天晚上悄悄来家告诉我，听红卫兵说你是华侨“有卤”，主要是冲著你的意大利摩托车来的，你要是不给他们，这事准没有个完。他们从华侨新村抄了一辆和你的一样的车，不会使，还要你去教他们哪。

不幸言中，此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人大附中红卫兵先后数次登门。用自行车链条抽打，逼著要的都是那辆摩托车，顺便把一切印有拉丁字母的家私衣物，包括中国出口的都席卷一空。再后来，来的是十九中和海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的父母官不大，所以眼界、胃口都小，来的早的，拿走了所有的旧军装；来的晚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甚么都要。除了水缸已家徒四壁，再后来的，是街道的红卫兵，他们一见已一无所有，理所当然的占了我的房子。回想多少年来，我都为自己改造不力，世界观没有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而苦恼，至此得到解脱，成了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

◇ 战利品

经过一阵子乱打、乱抄、乱扫，形势略有变化。许多老红卫兵因父母倒台，一夜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狗崽子，家中也被砸被抄。当时这种事，哪个单位、学校都有不少，当然最戏剧性的，莫过于情报头子孔原被审查，其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一事了。他们的儿子由赫赫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司令而销声匿迹。

当时北京许多单位的运动还没有展开，仅以身免的我，倒有了不少闲空，得以仔细见识红卫兵的打杀砸抢，和多次战绩展览。其中一次是在南汉宸（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编注）被弄死后不久，在他家办的。一个女红卫兵拿著一把折叠伞

站在一张书桌前，向观众解说，看，南汉宸的生活多腐化，连伞都用可以伸缩的。桌子上放著抄出来的“封资修”罪证，其实都是些法国共产党出版的人道报，和外贸部门的文件。没有几件衣物和生活用品，使人都不知南汉宸生前怎么样能够生活。实际东西都叫抄家的红卫兵据为己有，为了空的洋酒瓶子、饼干盒子、香烟罐子分配不均，还打了起来。

那时候甚么算封资修？甚么该抄？并无定论。风雅上乘如康生，喜欢据为己有的是字画、砚台、古玩。文革后，平反时被收归国有的金银、外汇，和永远再找不到下落的钟表、珠宝、瓷器，反正苦主已死，死无对证。在北京郊区连穿过的裤衩、背心也算是封资修，抄走这些至少省了布票，真正是谁也难以界定。我在一个老首长家还真看到一点红卫兵顺手牵羊来的战绩，那时候他儿子已经走后门当兵去了，不过仍仔细珍藏，夹在毛泽东选集里三张杨柳青手绘的春宫画。1978年平反落实政策时，抄家拿走的东西不知去向，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不过后来出现在纽约、东京、香港文物市场上的不在少数。中央美术学院积存了不少院内院外牛鬼蛇神家抄来的字画，其中不乏孤本精品。该院某一把手的女婿去日本留学时就随身带走了一两箱子。原中宣部某部长的女婿自费来美，因经济担保人是靠社安福利生活的老人，银行存款仅有1000美元，北京美国总领事馆为此签证拒签，辗转托我去向美总领事馆说项。事后我对他说“办是办成了，不过你去了怎么样生活啊？”承他坦率告我，会带些古董文物出去，随便卖一件就能吃几个月。叶帅原来的一个女婿（钢琴家刘诗昆——编注）是其好友，会用红旗车把东西直接开到班机肚子下面，送上飞机，海关管不了。里面有几件体积过大的东西，如古筝等，也已和中国民航打过招呼了。

◇ 人命几何

有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兴县农村，红卫兵把村里地主富农，连大人带小孩都打死的惨剧。实际上这种惨事北京那个区县没有？

据可靠消息，北京红卫兵到底打死了多少人，连周恩来总理都没有准确数字，说它死伤无数决不冤枉。在北京昌平县山区有个盛产山里红、核桃的村子叫黑山寨。1966秋后，所有地富（包括少量反坏份子）和家属都被打死，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扔下山涧，真正做到了“社会主义江山一片红”。土改后，经过十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地主、富农早已一贫如洗，但村干部家属和红卫兵，为了争死人剩下的衣裳褂子、缺胳膊少腿的炕桌、板凳、吃剩下的咸菜、杂粮，仍大打出手。我近年曾经去过那里，村领导已换过三四代人，由于当年铲草除根并无苦主遗孤留下，往事无人提及，逐渐被人淡忘。我向村领导提起此事并建议他予以平反，他答道：“老年间的事了，又没有人管，算了吧”。我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事隔五十多年仍在世界范围里清查追踪罪证呢。”他说：“那不成了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了吗？”

北京市内的惨剧不比郊区少，只是少有合家老小几辈都被打死的。1966年秋天十万人齐聚工人体育场，集会声讨崇文门外栏杆市反动资本家砍红卫兵的罪行，此事曾作为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证据，广为传播。十余年后，当年两个红卫兵当事人之一的S女士，作为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分配来和我共事，由于好奇，我问过她此事始末。

承她坦率告我：“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

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从我离开中国，就竭尽全力想忘记文革、红卫兵这类梦魇。也极少牵涉中国事务，老老实实当我的假洋鬼子。但世界上冤家难解，阴魂不散，想不到在大洋彼岸，也照受欺凌。和我十多年前同为铁杆共和党的一位很热心人权运动的朋友G女士，五六年前打电话给我说，一位杰出的中国民运人士来此演讲募捐，希望我陪她参加演讲会前的餐会。她向主讲人介绍我说“这位也是你们中国来的，和天安门事件一样，他在暴政下，被红卫兵打成残废……”。我寒暄后并没有说话，倒是参加餐会的宗教界人士听到后过来和我拉手致意，并问及原委。

我并不认识那位主讲人，更不知道他过去是红卫兵。在不懂中文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大声用中文质问我：是正牌的红卫兵打的你，还是出身不好的假红卫兵打的？又告诫我：民主、人权是世界上不可逆转的方向，你不要用过去红卫兵的个别缺点，干扰民主运动大方向，自取灭亡。看来事隔三十年，当年的“狗崽子”还是只有狗权，并未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了人权。

听中国研究生说，海外民运人士众明星中，不乏当年联动成员，和曾经上窜下跳之士。说它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因为表明“革命没有后来人”。说它是大幸中的不幸，是因为鱼龙混杂，虽经春雷，部份蝌蚪尾巴并未脱落，实在是积重难返。

◇ 牛棚琐事

文革中期，我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在北京一个工厂里和三十来个“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改造。“棚友”白天各自分头劳动，一早一晚都集中在牛棚里学习毛主席思想，批判改造自己。“棚友”中多数都年纪不太大，出身良好，属于说错了话，做错了事那种类型。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半老太太年纪大，显得扎眼，倍受专政队员折腾。所以平时除了我们三人说话外，别人怕受旧社会思想沾染，也就不太搭理我们。

一位年长一些的老太太叫吴碧雯，是前清贵族后裔，二十多岁就守寡，盼著独子赵某某长大成材。赵从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结婚，多年来夫妇同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书。因为信奉天主教，出身又不好，一直被视为异类，师范大学红卫兵一成立就拿他们夫妇祭刀，夫妇不堪毒打，一起自杀身亡。吴自己年轻时读过书，没做过事，四十多岁才出外电容器厂当卷绕工，根据墙上公布的罪行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带金丝眼镜，裹过小脚，但已解放，不积极批判封建主义裹脚，扫厕所站在水里还穿著袜子。吴并不封建，我们扫完污水休息时，她举脚让我这男人看过，虽是解放脚，但八个脚指都蜷在脚掌下。她说，我这人活在世界上都多余，还怕别人看脚丫子？我移民美国近二十年没有和她再联系，估计她早已经去世。老姐姐，希望您在天之灵有知，我含著眼泪，现在美国为您说句公道话哪。

另一位年轻一些的老太太，名字叫王秋菱，他和夫婿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购买了一家铁工厂。解放后王对政府号召表现积极，被捧为东城区政协委员。工厂公私合营后两年，王因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厂里当工人。王秋菱为人直爽，有甚么说甚么，她告诉我，一家人差不多同时全被关押专政，老头子在营口，两个儿子在北京，就她轻一点晚上还能回家。又后来才从她口中知道，小儿子是中学生喜爱化学，自制炮竹被关押；大儿子就是写“出身论”的遇罗克。

有一天早上，天气阴沉，“棚友”学习时间都过了，但专政队没有像往常一样叫大家出去劳动。九点多钟我正纳闷时，忽听得门外大声叫王秋菱出来，王站起来，经过我面前时，停下了两根烟卷，我小声问她甚么事，她没有说话慢步走了出

去。又过了一小时，专政队把我们全轰到操场上听公审大会广播，心中七上八下，脑袋昏沉，但我听到了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公审会后我们没有许吃饭，又押回“牛棚”学习，王秋菱还没有回来，但从门外专政队员大声热烈说笑，我听到王仍旧拘留在保卫科，并且已通知她，交她儿子死刑所用的子弹钱。

◇ 红色家长

我来美国以后，不只一次被人问到，当年红卫兵是小孩子，是年轻人，胡闹可以，但是他们家长不管吗？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抄家以后，生活无著，我时常在不避嫌的同事M家混饭吃，一天M君告我，老首长C将军叫你去他家吃饭，吃王八。王八，就是鳖，马家军赖以创造世界长跑记录的东西，也是原籍湖北的C首长，用以保持青春常在的东西，老家县干部每月按例发来四五十个。饭间首长谈到，红卫兵闹闹，实际上也很有必要。你看，四九年进城以后干部政策越来越不像话，甚么样出身的知识分子都能来当干部，那些延安过来的都捧疯了，清一清也好。还有1946、1947年在北京，天津入地下党的学生，一入伍就是正连级，甚么话啊！有的到了地方上，一去就是十六级，组织部门真乱弹琴。我装傻问他，那我怎么样办啊？他说你担甚么心啊，连你都不要，谁帮我们写信、起草文件、指示啊？C的公子在“西纠”，定然会秉承家训。

文革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有一位主管港澳事务的负责干部X君，今天避秦美国的金尧如、罗孚先生可能都认识他。当年有位潜藏在港英警方几十年的同志，大约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廖承志之外，可能只有X君知道他的底细。不意忽然一日，X接到指示动用这位同志，X急返广东向中央领导建议，此等小事不应动用该同志，以免危险暴露。但返港不久，X君又接指示，照原计划执行，当然该同志背景也就随即为港英获悉暴露，成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事后，上述中央政要无一承担责任，承认自己曾经下过动用的指示。X君官小，成了唯一可能被怀疑的对象，被拘留审察于四川某地农场。直到文革开始后，为了方便审查，押来北京，关在陶然亭监狱，与李一氓隔邻。文革后期李一氓获释，X托李带一申辩信给中央，不久X也在无结论情况下，获释回西安门宿舍，发一国务院出入证，每月给150元生活费。X君有两子，幼子因为“联动”打人致死，因爸爸有问题无靠山，被北京卫戍区拘捕入狱。长子天资过人，因爸爸问题，文革开始时已相当早熟，不象一般干部子弟那么样，无知加无礼。由河南农村插队回京，一无亲人，二无户口，努力自学成材，英文、法文、日文都达到很不错的水平。X君与外界隔离多年，在获释后才得知1966年红卫兵的情况，和自己孩子的情况。他痛心的说，我像他们那么样大的时候，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可是在错误的领导下，革命后代成了土匪，甚么都不会，甚么都不懂，只会打砸抢。我自己被冤枉关了多年，我认了，只可惜没有人管孩子，我们的孩子全毁了。我告诉他，并不全如此，他的大儿子很不错。X说老大从文化上看可能不错，可是我们X家坚信马列主义，他不信。

◇ “失控”在北京

中国是百姓一举一动都受到控制的一个国家。即便在无法无天的文革中，一个人一个月许吃几斤粮食，这些粮食中有多少斤是面粉，多少斤米，多少斤杂粮。一个人在甚么时候许结婚，婚后那一年许生孩子，孩子出生后具有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一不在控制之中。那么为甚么1966年，红卫兵残害打死打伤那么样多的人，而没有人管？是毛泽东下命令打杀的吗？显然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等等毛论，已经有了几十年，为甚么解放初期的学生没有如此暴戾？许许多多善良正直的美国人，都问过我这个难于回答的问题。

依我所见，依我所挨之打，这是个渐进过程。一开始打人是发生在学校内，因

为1966年以前，中国的学校，还是实事求是的依据学习成绩来评定学生。想打人的，也大都是那些除了出身血统好之外其余什么都不好，出不了风头心中积怨，认为学校领导不识货的红卫兵。被打的就是作家郑义提到的校长万邦儒和团委书记，那种被认为没走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人。当时不是当权派，因政治成份不好而被打的也有，如近年来美国访问过的钱伟长教授夫人孔祥瑛，但总的说来，人数还不算太多。而较成熟，书读得好的干部子弟，也没有多少这种“谭力夫”心态。据说101中学，当年在校时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毛远新，就公开对101中学红卫兵的作为有保留。事实上在1966年以前，因出身好而书读不好，怨天尤人，迁怒社会的现象，由来已久。哪一个被派去清华大学工农干部速成中学教书的教师，都头大，即便是工农出身的党员教师，也照样会被一些学生责怪“对学生缺乏阶级感情”。哪个单位也对分配来的这种毕业生敬鬼神而远之，工作不会做，抱怨特别多。后来，也有不少争得了高级这个、高级那个的头衔，近年我接触到的几个，除了年龄外，未见有甚么长进。

打人，包括打人致死，和吸毒一样会成瘾。在一个被血统论毒害了的社会更加如此。打人十分解闷、好玩，打得他妈的鸡猫子直叫，挺过瘾。打人可以表现立场坚定，党性成熟，促成提前入党，和跟著来的物质利益。打人也可以报私仇，可以掩盖一切做过的贪污盗窃等犯法行为，真是何乐而不为。

北大附中红旗第二次来抄我家的一个女生，比我家的八仙桌高不了多少，用自行车链子打人特别凶狠。她走后，我去北医三院急诊室包扎皮脱见骨的伤口时，大夫还以为是汽车撞的。经我解释后，大夫问我她怎么下得了手？我坦承，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我今天也还是不知道。

我有一个以前的部属，那时在总后集宁办事处工作，出差顺便来看我，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事后他没肯立即回去，在几天调查后，一天非拉我和他一起进城，说去看“刑场”。去的是景山附近的北京市少年宫，刚进门就听到阵阵哀号惨叫，院子里、屋子里都在打人，而且一个地方也不止一两起，自行车链子是人手一件的刑具。我自己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人，但也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完全给镇住了。

我急速退到门口，不料传达室里也正在打人，两个十三四岁的红卫兵，正在抽打一对老夫妇。老太太是小脚已被打倒在地，地上有一大滩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血。老头子看见我们在门外看，就冲著我们喊求救：“我不是逃亡地主，日本投降前四年我就来北京了……”。我们硬著头皮了解了一下，老夫妻住在宽街，公私合营后，在家开卖烟卷火柴等零碎小铺，应当算是小业主。红卫兵说他们是逃亡地主加资本家。这两个红卫兵是灯市口的一个中学的学生，我们劝他们放人，他们不肯，反问我们甚么出身？

这时有红卫兵押著四个满身是血的老人，脚步蹒跚的抬著死人从院子里出来装车。我们跟著走到门口，看见门口有辆三轮卡车，车上已堆著五个死人，天气炎热，腥臭无比。待我们再回到门里，那个老太太已经打死了，老头子倒在地上喘气，已无力再喊求救，红卫兵坐在传达室的椅子上休息呢。回海淀的路上，我们两人都想说话，心里堵得很，伤口也很疼。到家门口，他站住对我说：“我不进去了，明天早上就回部队，你好好当心保护自己。咱们革命革到这份上，我都不知道该说甚么。我看只有周总理有能力、有威信能制止这么样乱来。”我说就看他想不想管了。

不久，周恩来总理对抄宋庆龄家的红卫兵的讲话传出来了：“你们要去她家扫除封资修干甚么？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份子，还有甚么东西不是封资修？明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年，还有国外的人来参加。你们把她家抄了，别人看见会说甚么？

”。考虑到宋庆龄解放前，特别是革命还很困难时期的贡献，考虑到解放前后，周恩来对这位“国母”讲过多少溢美之词。老太太当年真听见这话，不知会气得背过几回气去。反正我听见后，该死该活都死了心了。

□ 原载《民主中国》1998年 第三期

~~~~~

【微观历史】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

• 郑 义 •

# ◇ 文革之前的清华附中

作为可供剖析的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兼缔造者，我具有典型的意义。在文革时期的清华附中，我既是最著名的被迫害者，同时也是那个迫害制度的拥护者。一九六三年，我从北京三十五中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在清华附中我不是学习成绩顶尖的学生，但体育成绩较优秀，在学校里是百米冠军（国家二级运动员）和铅球冠军（国家三级运动员）；此外，在文艺方面有显著表现，是学校重要文艺活动的组织者；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积极要求进步”，任班干部、分团委宣传干事。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我在当时格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清华附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学生。但是，我的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郑璧成是中共建政之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托拉斯“民生公司”（航运、煤矿、机械制造等）的主要创办者领导者之一。记得初中入学第一天填写履历表时，困窘得满头大汗才在“家庭出身”一栏里艰难无比地写下“民族资产阶级”六字。从此，“出身不好”便如影随形，伴随著我整个青少年时代。为了争取一个较少歧视的小环境，为了在同学中得到一点应有的做人的尊严，我必须加倍努力，特别是加倍“改造思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出身阶级”。无论我怎样“靠拢组织”，“每日三省吾身”，都无法摆脱家庭出身的浓重阴影。小小年纪，便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突然哪一天所有的档案全部遗失。进入清华附中之后，“第一课”就是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斗争成果展览”。这是一个常设的恐怖的展览，所有的文字和图片，都在歌颂“党”的光荣伟大，并警告我们不得与“党”有丝毫对抗。我相信所有清华大学和附中的学生将终生保留这个印象。

文革之前，蒋南翔控制的清华大学就是一个相当左的小社会。但学校毕竟是培育人才的地方，老师和校方天然地喜欢好学生并对那些娇纵散漫的干部子弟敬而远之。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学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影响强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扩大知识面（比如每周一节电影课，放映科技及外语片，鼓励各种课外小组及讲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反对满堂灌）、减轻学生负担（反对课外加班学习）、重视加强学生体质（强调田径运动以提高基本体能，甚至连下乡劳动，也把增加体重当成重要指标）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努力。清华附中激烈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甚至明确提出仅学习成绩好不算好学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在清华附中的几年，恰好又是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最为宽松的时期。当时的“阶级路线”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出身而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清华附中是个干部子弟较多的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把那“重在表现”四字如水中稻草一般死死抓住不放。虽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已经在大力贯彻，但从学校本身的社会职能出发，校方也尽可能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以期提高教学水平，并避免在学生中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斗争。在这样大小环境之中，我成为全校著名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这也就是后来红卫兵咒骂我的“学校的大红人”、“修正主义苗子”之来由。



#### ◇ 始于“娄熊事件”的政治派别

但校方这种走钢丝绳的策略在越来越紧的政治气氛里终于失去平衡，其标志就是发生在我们高631班的“娄熊（打架）事件”（见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载本刊ZK9612D，此处从略——编注）。“娄熊事件”有其历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军覆没。

“娄熊事件”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后，阶级路线的调子越唱越高。干部子弟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尊荣，知识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说“有问题的”出身）的同学亦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卑下。一道“阶级”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旧日因个性、爱好、同桌等“非阶级”因素形成的友谊几乎化为乌有。对于我来说，如果“反右斗争成果展览”是清华附中的第一课，那么这就是第二课。几乎滑向“反党”的危险境地使我更加敏感地聆听党的声音。不久之后围绕电影《北国江南》的激烈辩论之中，我们班依然是按照“娄熊事件”形成的界线分为两派。值得思索的是，这回倒过来了：以我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训，紧跟形势，对党所厌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发起批判，本来就反对“人性论”的干部子弟们因“对手”站在批判的立场，便本能地站在了辩护的立场。这一回合阵仗颇大，两派拖开课桌，在教室里摆成“楚河汉界”。双方唇枪舌剑，“上纲上线”，直吓得老师们连旁听都不敢。几次大辩论之后，我们略占上风，因这回是我们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而他们反而变得无所依恃。

与此同时，高631班的团支部大会也变得剑拔弩张。我在支部里不过是宣传委员，但实际上是一派之“领袖”。自“娄熊事件”之后，干部子弟们想依靠“血统高贵”掌握班级和支部权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提出发展团员要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想让干部子弟都入了团，成为多数。当时我们的权力意识远不如他们，主要是受不了他们那股骄横，于是抓住“阶级路线”的最后四字“重在表现”，要一视同仁。当时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是王铭入团（见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载本刊ZK9612D——编注）。在这种局势下，他们要发展“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我们挡不住。我们要发展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现好”的同学入团，他们却百般阻拦。本来支委会背后讨论一下就可以决定的事，在高631团支部支委会上就很难有统一意见。即便填了表，支部大会上能否过关还是另一回事。于是，我们班发展团员的支部大会，就成了激烈的战场。每逢我们班发展新团员，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开会之前，两派都做好准备，上了会，便据理力争，互不妥协，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这种尖锐对立的状态下，文化革命开始萌动了。

文革在我们班形成的派别，就是自“娄熊事件”开始，后经《北国江南》辩论和发展团员巩固的两派，经纬分明，几乎丝毫不错。

#### ◇ 红卫兵当权前后

一九六六年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批判在清华附中也激烈展开。小字报、大字报贴满了教室和楼道。虽然两派都尽量显得尖锐激烈，都不甘在这场显然来势汹涌的政治运动中落人之后，但干部子弟们很快就不满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批判，他们要针对学校“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压制”干部子弟、“包庇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实发起挑战。



他们开始秘密碰头，交换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有关上层政治的消息，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当同学之间展开“学校党支部黑没黑”的辩论时，干部子弟们早已雄心勃勃，准备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了。一位干部子弟对同伴说：“咱们的父辈就是在青年时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现在该轮到咱们了！”他们天然地明白政治为何物，天然地明白权力为何物。他们的父辈是今天的统治者，他们当然应该是中国明天的统治者。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五月二十九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青年法西斯别动队——红卫兵。他们也许并没有料到，残暴血腥的地狱之门即将假他们之手豁然洞开。

六月二日，红卫兵贴出了第一张把矛头指向校领导的大字报。校方摸不清底细，哪敢贸然反对？包括我们班在内的一些同学也针锋相对地贴出肯定校领导的大字报。六月八日，几十名北京城里的干部子弟骑车来声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学校怕出事，关了西校门，上百学生隔著铁栅栏门对峙。一篇老红卫兵的回忆文章指我在门外组织。我可能是在门外与他们对峙，但似乎没有“组织”。我哪里有胆量出面组织？包括仲维光在内的许多人早就希望我能够出面组织同学对抗红卫兵，但我早已被“反右展览”、“娄熊事件”及干部子弟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那段局势不明的日子里，我最大的胆量不过是在饭厅顶上涂写大的“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以示曲线对抗。当天真正的勇者是高632班的宣夏芳，她大声宣读了自己写的一张大字报，称红卫兵是“黑卫兵”，称他们的后台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我的怯懦虽然未能使我逃脱劫难，但至少没有像宣夏芳那样被中共最高层直接打成反革命。在上述老红卫兵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到我曾到老红卫兵占据的屋子去，向他们宣布：“你们对了，我错了，我向你们举手投降！”我十分艰难地从记忆深处找到了这个场面。具体时间记不起了，反正是在局势即将明朗之前（似乎是工作组进校后，未表态支持老红卫兵前）。作为红卫兵们的宿敌，虽然我仅仅是暗中对抗，但他们始终把我视为他们的头号对手，我知道这场至少长达两年的较量已经在最高层的参与下有了结果，我的下场将十分可怕。我只好将在他们面前从不低头的自尊弃之不顾，向他们宣布“投降”。这是一次绝望的挣扎：也许比顽抗到底要好一些？在场的老红卫兵们热烈鼓掌，他们把这作为胜利的信号。似乎记得还有人来同我握手，说认识到错误就好，欢迎。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 ◇ 受害者的普遍的道德沦丧

自此，红卫兵“造反”是否正确已无人再敢争论，新问题是：他们说我们是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而我们只承认客观上犯了政治错误，主观上还是无限热爱党和伟大领袖的。这种表面上为维护政治权利而实则为了坐稳奴隶地位而进行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在早已遗忘的记忆的深处，今天，我又找到了羞耻的见证：在形势急转直下的那几天里，为了表示与“蒙蔽”和“利用”我们的“黑帮”划清界限，我也主动参加了两次登门问罪的行动，闯进清华大学主管附中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家和万邦儒校长家。邢不在家，只有他所爱惜的大黑猫卧在沙发上惊恐地向我们张望。万校长也不在，似乎是师母与孩子避在卧室里，书桌上有张纸，纸上孩子稚气的字体：爸爸，你为什么犯错误，成了黑帮？我要同你划清界限！我们这些昔日的“保皇派”们愤怒大呼：假的，你们是想蒙混过关！虽然我们未像红卫兵们那样疯狂，但灵魂深处，那种想赎罪想得到赦免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卑鄙，是

同样疯狂的！这件事，我遗忘了。历史同样遗忘了。谁会记得清华附中著名的受害者在文革之初的一次小小的过失呢？谁会去追究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在未成年时所参与的集体道德沦丧呢？八十年代中期，万校长叫我回母校，要我向同学们讲点什么。那时，我对文革的反省尚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仅仅回忆了那些难以思议的残暴，我看见老校长眼里噙满泪花。现在，如果再回母校，我当坦白我的卑鄙。但万校长已经过世了，他年轻有为，却在文革一击之后过早地走完了坎坷而不得志的一生。我无法再当面向他谢罪，请求他的原谅。我也回不了祖国，亲自向师母及他们的孩子谢罪。我只能希望在美的一二百老同学中会有人把这篇文章带回去，过迟地请求他们原谅。

工作组进校一两天之后，清华附中进入了红卫兵专政时期。校长老师开始挨斗。晚上的批斗会是最为恐怖的。全校师生列队端坐在教学楼前的地上，门厅前摆几张桌子，工作队和红卫兵头头坐上一排。在精神上彻底崩溃的同学们把口号喊得响彻夜空，将满腔仇恨与无限悔恨洒向台前低头认罪的“黑帮”。校长老师和那些抵抗过红卫兵的同学都成了“某狗”，校长是最著名的“万狗”，我是著名的“郑狗”。我们这些“狗”们，都竖起耳朵，心惊肉跳地等著“点名”：随时会有人站起来大声哭诉揭发自己受蒙蔽的无辜，揭发到谁，全校师生就会厉声齐呼：“某狗，站起来！”“某狗”就会被推搡至台前，低头接受公开羞辱。七月底，骆小海野蛮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载本刊Z K 9 6 0 3 A——编注）“横空出世”，（稍后，熊刚起草了血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为他们敌视平民的“造反精神”作了赤裸裸的诠释。）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发表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支持他们“造反有理”。于是，全北京干部子弟纷纷组织起来，为毛泽东而战，为维护和巩固给自己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特权的制度而战！他们将矛头对准那些已饱受压迫与歧视的平民及贱民，对准那些据说胆敢压制他们，妨碍他们获得更大特权的校长老师。红卫兵们得了正统，气焰万丈。一般同学人人自危，却强作欢颜，热情欢呼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天夜晚，清华附中一片节日气氛，探照灯把大操场照得很亮，全校师生手拉手，跳起了欢乐的集体舞。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红卫兵们祝贺，卜大华、宋柏林（其父为解放军装甲兵学校校长，听说多年前已为副军级）等有幸与伟大领袖握手的红卫兵头头，成为同学们崇拜的中心。他们那与伟大领袖有过肉体接触的手，被人们热情奔放地争握（几天舍不得洗手）。自然，黑帮和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是与这狂欢无缘的。我徘徊于舞场边上，既不敢加入，也不敢不去。我很恐怖，自知在劫难逃。我也很痛苦，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反动派”，我是真心拥护党的呀！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于或愿意正眼瞧我，指向我的都是仇恨的目光！那个晚上，在狂欢的操场边上，唯有驻我们班的团中央工作组员与我有几句“犯了错误没关系改正就好”的教导，我默默无语却感激涕零。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温暖的语言了！得了当今圣上的支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清华附中的武斗迅速升级，进入高潮。万邦儒校长韩家鳌副校长每斗必打，身上早没有一块好肉。分团委女书记高惠英被打瞎一只眼。我高一班主任刘树华被打得跳了锅炉房大烟囱。我高一同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我班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赶到北医三院，称反动学生，不许抢救，最后躺在停尸房足足死了一个星期。高一女生杨爱伦撞火车自杀未遂，留下残疾……在我的记忆中，打校长老师在先，打同学在后，因当局规定不许整学生，须待革命愤慨高涨起来，“自发”进入“红色恐怖”的高潮。

#### ◇ 校园私刑及精神自辱

“红司令”接见的无尚荣耀，迅即变作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洒向人间：全北京城进入了“红八月”的恐怖地狱。由于清华附中的特殊情况——知识分子子弟为主、良好的校风及红卫兵的创始者们抱负甚大——对我们“反动”师生的“触及皮肉”尚不及城里的“杂牌”红卫兵。但血既然开始流了，就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

辑流向疯狂。八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同学们正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天天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我批判”，我们班的红卫兵小头目尤小梅（张明、熊刚、宋柏林、袁东平等已成为校一级领导）冲进来，杀气腾腾地尖叫：“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杀人啦！他们向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也许还流泪了。她的感情很丰富。她曾是一名业余演员。她语无伦次，未向本班同学讲清原委（李国庆事件，北京城里的抄家打人中，一位名叫李国庆的举起菜刀自卫。见本期上文——编注）便一拍讲台，尖叫道：“郑狗，你站起来，还有你，戴狗！还有你们……”一下子，高六三一班立起以我为首的“四条狗”。

我默默摘下眼镜。要开打了，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果然，尤小梅发疯地喊：“为受害的红卫兵战士报仇啊！”我不知道她是否甩臂举拳，因为我的眼镜已放进课桌。但那声音我记得：悲愤、悲怆，如斗争地主的电影里悲痛欲绝的穷孩子的母亲。

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站起，有的红了眼圈，有的大哭，在誓为红卫兵复仇的悲壮气氛中向我们扑来！刹那间，教室里分成几个圈儿，十几个围殴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齐上……紧张的气氛中，人人自危。因大多数人自“娄熊事件”以来就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娄熊事件”的主角娄琦也不遗余力。打我最狠的是班长王某，平素与我关系不错。他本是干部子弟，谢觉哉之养子，只因档案里说他生父有叛徒嫌疑，血统不太纯正，便被本班干部子弟鄙视，自然也是抵制红卫兵的主力。他用力抽打著，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对这场暴行中指挥者、打人者的眼泪，多年来我一直大惑不解，直到弗洛伊德使我加深了对人性的理解。原来那眼泪是鸦片，麻醉药。施暴之时，每一个人都要对良心进行深度麻醉。每一个人都要设法使自己相信：他现在已悲痛欲绝，施暴不过是难以抑制的正义的冲动。应该加以同情地理解的，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革命崇拜。红卫兵的胜利，特别是“最敬爱的毛主席”之亲自出场，把同学们无可挽回地划到“反革命”一边。这也是真诚的悔恨之泪。

最初的乱打之后，我们被打得跪倒在地，皮带拳脚如雨点般落下……支持不住了，我们被打得爬在地上……鲜血和汗水浸透全身……在时而尖锐时而钝重时而令人晕旋的痛苦中，我几次想跟他们拚了！我估计过形势，我知道一定能成功：多数同学出于旧情与惊惶来不及反应，以我的威信和我那全校公认的大力士的威慑力，我有把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几位作恶多端的纨绔子弟从窗口扔下楼去，然后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我终未作出这壮举。——也许我真是反革命？也许革命从来就是这样如万钧雷霆不免误伤好人？我挣扎不出这思想的牢笼！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到那一天：党终于发现我是她的好儿子，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总会雨过天青，总会发现这一切都是误会。当然，在心的深处，也同时存在着对死亡之恐惧，对生之眷恋。我无法将自己打扮成受难的英雄。

过去还可以，现在不行了：我成了以解剖灵魂为职业的作家。从早上八点多开打，一分一秒不停地打到十一点多，直打到昏厥。白衬衣被打成了碎片，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汗，但没有流一滴泪，没有求过一声饶。——过去，我在心里曾树立过自己的英雄形像。多年后，当有勇气再次检视伤口时才明白：没有求饶是因为求饶毫无意义。这不是偶然闯入你家的一夥强盗，也不是战场上素无个人冤仇的对手，这是必欲置你于死地的宿仇。

那一天，几乎全校都在打同学。打得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打算都打死——王铭、卜大华、张明等学校红卫兵的大头目们慢悠悠出现在教室门口。“别打了。”他们的口气很温和，“要注意政策。”他们在我面前掷一张纸，“写认罪书！”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爬在地上。“老实点！”一把不知从哪儿抄来的日本大军刀

凉飕飕架我脖子上。我知道现在不会砍头，我并不害怕，但仍然用几乎被打得失知觉的手颤抖地写道：“我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在团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血和汗滴在纸上。

未及写完，他们就令人把我们架走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不过是一场供人观看的仪式：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爬在地上写认罪书；红卫兵把战刀架在敌人脖子上，威风凛凛！

仲文所述的操场上殴打，是发生在这之后，只是展览性质的。打人工具有了改进，一种用塑料跳绳拧起来的鞭子，很重，比皮带厉害得多，几鞭下来，人就能疼昏。所谓劳动，是徒手拔操场上的矮草，其实是向所有的学生提供一个免费打人的机会。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要感谢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高度的政策性：由于有纠察队看管，打得很有节制，一见超出了展览的目的，便会加以制止。否则，让那些想赎罪或想练手的抡圆了打，还得再死几个。

#### ◇ 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望

那天打的人很多，但私设牢房关押起来的只有几个他们恨之入骨的“反动学生”。那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位于教学楼门厅左侧。屋内满地血污。我平生第一次闻到如此浓烈的血腥味儿，浓得呛人。“囚犯”们浑身是血，或坐或躺，满眼绝望。天黑后，高623班郑国行同学轻轻爬过来与我商量：要逃，不逃出去就没命了！我哪儿还能逃？就算伤轻的同学能跳窗越墙，但整个北京都是红卫兵的天下，带伤的都是反革命，在大街上被人发现肯定死得更快。不到半夜，我开始抽搐，头向后仰，身子呈反弓形。同学们急砸门，说我要死了。一辆平板车拉我去清华校医院。半昏迷中，我看见我的一只手垂在车外，随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还有一些印象：辐条一根根向前转动，黑漆漆的空气清新醉人……在红卫兵监视下医生开始检查。戴眼镜的胖医生不耐烦的大声喝斥：“是不是装的？！”后在我脊椎上发现一处被皮带头打得凹下去的伤口，才缄口不言，包扎打针送回牢房。后来同学们告诉我，那天铜皮带环都打断好几个。没两天，红卫兵们将我们的血衣收走。然后，我才迟钝地明白，这是销毁罪证。继而才更加迟钝地明白：连他们自己都预感到这革命行动可能遭到清算。

那一天的准确日期，我记不清了。是八月，尾数似乎是“八”。不是十八，那天毛检阅红卫兵，也可能是二十八，但好像又晚了点。我想我是“有意”回避了忘却了。那恐怖已过去整整三十个年头，关于那日期，记忆中依然是一片恐怖的空白。那日期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因此首先被遗忘。被遗忘的，不仅有血腥，还有懦弱与耻辱。我可以反抗，但毕竟没有反抗；我明知砍不了我头，不是也违心地写“认罪书”了吗？偌大北京，不是只有一个李国庆吗？如果每一个被迫害者都操起菜刀拚死反抗，那些青年法西斯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就征服北京吗？当然，这是以卵击石，只会遭到更疯狂的屠杀。但是人的尊严便不会崩溃得如此彻底，它会在反抗者的血泊之中获得复苏的养料。

红卫兵将我赶回家养伤。城里的家被我初中所在的三十五中红卫兵抄了，母亲被批斗毒打，并赶回四川双流县老家。

从所有的迹像看来，我确凿成了反革命。

对于一个充满革命梦想的青年宣布他是反革命，等于对一个最虔诚的基督徒说上帝不承认他是他的子民，永远没有得救的希望！我时而绝望，时而坚定，时而怀疑，时而自信——信仰之火如地狱之火焚烧著我年轻而纯洁的灵魂！

十月一日，“国庆”。我孤独地坐在收音机旁，听著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欢呼。播音员激情满怀地介绍著红卫兵们如何一浪又一浪扑向金水桥，扑向天安门城楼，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热泪打湿了衣襟——毛主席招手了，毛主席微笑了！我眼前浮幻出一幅幅鲜明的图画，那千万面红旗如在我心坎上摇动——但是我，一个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青年，却只能龟缩在小屋里，我不敢出门，灰溜溜的，我是“反革命”！我无法去那沸腾的广场瞻仰毛主席的风采，我甚至被剥夺了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只要一戴上毛主席像章，便有红卫兵一把扯下，“反革命！狗崽子，你还配戴毛主席纪念章？”那仇视与轻蔑的目光教人寒彻心腑！你们扯吧，你们打吧，我要戴，要戴，要戴！我霍地拿出把锥子，解开衣扣，在左胸、在心房的上方，猛地横刺了一个洞。我把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上，感到一种罕见的舒畅。

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藏在衣服里。我感到幸福。仿佛所有的冤屈与痛苦顿然解脱。后来，伤口化脓了。我每天坚持上药，希望伤口长好，如女人们耳垂上的小孔，胸前永远有一个秘密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地方。一天正上药，邻居家的孩子推门而入，我只好支吾一番。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我心灵的秘密。不久之后，化脓的伤口长好了，完全溃烂了的那个横孔，结为一永恒的伤疤。

在控诉“资反路线”，控诉联动暴行的日子里，我曾在几所中学里讲述过我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每次都泣不成声，昏厥过去。台下也是一片哭声，不断有人被抬出去。多少人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啊！对毛主席的爱及忠诚，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最圣洁的感情！在文革的血与火的日子，有多少青年高呼著“毛主席万岁”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出生入死，慷慨赴义啊！

毛泽东如一位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创世神，牢牢地占据著我们心灵的中央！  
这个伪君子欺骗了我们，蹂躏了我们，强奸了我们！  
我们不是几个人，几百个人，几万个人——我们是整整的一代、两代、三代人！

强奸了整整几代的人，将受到的惩罚是可怕的！  
上帝啊，请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

——以上是我一九八九年底逃亡中写作《历史的一部份》时的自我认识。当时，在屠杀之后，我批判的矛头自然主要指向欺骗性的“共产主义信仰”（今天我也并不完全否认这种信仰在我们思想行为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但是，这段完全缺乏自省的文字显然是片面的。“纯洁的灵魂”——真的“纯洁”吗？我感到汗颜！文革前争当“无产阶级接班人”不过是想坐稳奴隶的位子，文革初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望。

#### ◇ 极权制度下的反抗及原罪

哈维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

初中时代，我就开始努力批判家庭出身，深挖“阶级根源”，并以此加入共青团。我用自己的行动助长了极权社会的“种姓制度”。

高中时期，我是清华附中音乐舞蹈剧《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组织者和编导者。这是当时极具欺骗性与煽动性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翻版，在北京的中学中独一无二，被誉为“小东方红”。我积极参与了极权社会的全面意识形态化。

“娄熊事件”，我低头检讨，认可“阶级路线”，为后来红卫兵的诞生铺平道路。

《北国江南》讨论，我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后来红卫兵的残暴扫除思想障碍。

文革之初，我积极参与批判“三家村”，后来自己也遭到红卫兵“上纲上线”的“大批判”。

抵制红卫兵失败，我“反戈一击”，以图自保，后来自己也落得众叛亲离。在恐怖的“红八月”，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我丧失尊严，屈膝认罪，使暴行通行无阻。

成为“反革命”后，将无情的现实解释为误会，坚信总有一天好心的主子会垂顾冤情，体恤耿耿忠心。

每当我忆及那些被无产阶级专政绞杀了的睿智而英勇的先行者们和千百万无辜受死的人民，我真正感到我是有原罪的。

我并非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我只是证实我们既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缔造者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否认极权社会的封闭与欺骗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可以反抗的时候放弃反抗，不仅使个人的处境更加悲惨，而且使全民族堕入精神自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多半注定被压倒，但并没有注定被征服；我们多半注定遭受迫害，但并没有注定同时遭受互相迫害和自我迫害；如果遇罗克式的人物多几个，哪怕只有十来个，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就不会陷入那种地狱般的精神绝望；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自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哪怕自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暴政的大规模揭露和抵抗，文革的悲剧就不一定必然发生。共产暴政看起来势不可挡，那只是它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

这种在不断反省中越来越意识到的原罪，使我深感耻辱。因此，我对在任何艰难处境下保持人的尊严变得极度敏感。在某种意义上，我对极权制度的不妥协的抵抗，也是为了洗刷耻辱，争得一点起码的做人的尊严。

我希望我的反省不会被误解为对造反派的全盘否定。我仍然坚持“两个文革”的基本观点。纵然是“奉旨造反”，纵然是没有挣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纵然……等等等等，但造反派挑战中共十七年极权统治却是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从清华井冈山到湖南省无联到广东“李一哲”，文革造反派一步步走向觉醒的历程清晰可辨。

历史不可能具备科学实验的“理想条件”，（严格地说，科学实验也没有真正的“理想条件”，）我们总是在历史已经给定的复杂条件下走向自由与尊严。就清华附中来说，老红卫兵从“造反”迅速走向保守，而“井冈山”红卫兵却从最初的“保守”最终走向造反，表面看来存在一个明显的错位，实际上，一派要巩固极权统治另一派要反抗极权统治的基本格局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错乱。时至今日，中学文革两大派的“死结”也未能解开。官僚子弟的代表人物进入各级政权，成为极权体制的组成部份；平民子弟的代表人物则放弃幻想，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当然，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有些干部子弟认识到极权政治之残酷，转向人权与民主。有些平民子弟则出于功利，进入体制。两派中还有许多人从此淡出政治，经营学术、经济，也颇有建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京生，这位当年的老红卫兵后来走向人民的苦难，走向争取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伟大事业，成为当代中国的骄傲与光辉

典范！)

一九六七年，随著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的崛起，掌权不足一年的“老”红卫兵在清华附中一败涂地。他们暗含恫吓地在大饭厅里用大字抄出一首七绝：

兵家胜败寻常事，  
含辱抱羞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遗憾的是，那一段历史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提供“卷土重来”的机会。

一九六八年，清华附中血战了两年多的两大派终于各奔东西。我们准备“上山下乡”，官僚子弟们准备参军、留城。

在八达岭长城上，我们班两位个人关系甚好却分为两派的同学要分手了。袁东平（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之子）环视著辽阔壮美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绰号为“老羊”的宋海泉（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东平气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学的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中间派没什么大出息，你们井冈山的行，但你们一般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庭，你们距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由我们来掌权，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

在我们班教室里，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张明特地找到我，极为正式地发表临别赠言，这可能是自“红八月”之后我们之间的唯一交谈：“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坚定不移地走出教室。

二十年之后，我们呼唤改革，他们咒骂“和平演变”；我们在天安门前游行，他们请缨坚决镇压。这种拉锯战终于在六四清晨画了个鲜血淋漓的句号。看起来，他们终于“卷土重来”了。

但也正是此刻，历史为他们所寄生的极权制度敲响丧钟！

当然，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

前两年，清华附中老三届的同学们捐款在母校树立起一座教育家万邦儒的铜像。这不仅表达了我们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含蓄的集体忏悔。

我想，清华附中还应该有一座纪念碑，以纪念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但碑文很难撰写，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准确评价。如果将造反派也纳入这一运动，事情就更为复杂。即便政治评价是可能的，随著时间的流逝，正误也将变得愈来愈不重要。有一句话可能是适宜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因为这句话既没有回避政治，又穿透政治直指人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忏悔的。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及我们后人的最深刻的遗训！

1996年秋于普林斯顿

□ 原载《北京之春》第 42期 1996 / 11

~~~~~


【学术动态】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海外华人学者文革探讨之我见

• 高默波 •

三十年来海外华人学者的文革研究有过几次明显转变。早期港台一些学者抨击文革残酷得不到左派学者的重视和认同；后来随著大陆官方否定文革，跟著一起谴责文革。到了九十年代，回忆录和传记提供了不少研究文革的素材。许多年轻学者对文革研究逐渐深刻和复杂化。

海外华人学者是个很松散的定义。高皋和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是一本最有影响的有关文革的专著。这本书的作者虽然在海外，可书是在中国大陆发表的。另一本有影响的专著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十年》。可是王年一不在海外。

◇ 六、七十年代港台学者的批判的声音

一般来说，港台地区被认为是“海外”。可是很多大陆的作者如权延赤（包括《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和师东兵（《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的书都是在香港发表的。

有些人并不是以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立场著述某些书，如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写《鸿》的张戎，写 *Born Red* 的梁恒以及写 *Son of the Revolution* 的高源。不过现在有很多的大陆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他们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做研究，作品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

在文革刚发生不久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港台的一些学者一方面收集原始资料，如中共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一方面抨击红卫兵的暴力和中共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比如台湾的《匪情月报》、黎进伟的《红卫兵实录》、汪学文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和丁望的《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和人事问题》，以及司马长风的《文革始末》和陈立生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斗争》。在当时反共的冷战的气氛下，港台占压倒势力的声音是揭露文革的阴暗面。

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正是西方左派在大学校园里兴起的时候，一批左派学者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深表同情和希望。因此，他们不太重视对文革的谴责，认为只不过是预料的反共叫嚣而已。对他们来说，文革是有重大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意港台主流意见的西方学者数量很少。

一位比利时出身的学者化名 *Simon Leys* 写了一本叫《皇帝的新衣》的书，说毛发动文革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权力。他抱怨说，西方人都受共产党的骗了。

◇ 八十年代历史的颠倒到九十年代的回忆录和传记

到八十年代，历史被颠倒过来了。一方面，在冷战结束的气氛下西方左派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大陆官方公开否定文革后，一大批揭发和批判文革的文献和作品问世。现在谁要是毫无保留的赞扬文革，肯定会被认为是疯子。除了少数学者外，西方人也跟著中国当局及当初港台一样谴责文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蒋家独裁解冻的气候下，台湾学者在研究文革这个问题

上比大陆出来的学者更少感情用事和主观武断。但从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和文革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打击的对象，他们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大太深了。对他们来说，不全面否定毛泽东只是政治的需要。但道德的愤怒和个人的冤屈终究不能代替学术研究。

海外学者评文革有一明显的特点，那是从传统中国文化来解释文革中种种看起来无理性的行为，而且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革中种种丑恶行为是传统文化丑恶部份的重返。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数是从大陆出来的学者；另一种意见认为，文革的事之所以能发生正是传统文化被破坏的结果，这种意见的代表是美国华裔学者林毓生。于是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不住在传统文化圈子里的人强调传统文化的好处，而经历过激烈反传统文化斗争的大陆知识分子却揪住传统文化不放。总的来说，海外华人从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来分析文革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学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而有影响的倒是传记和回忆录。

回忆录和传记对一般读者和学者都有吸引力。对前者来说，回忆录和传记有故事情节和感情反响。对学者来说，它们为理论和研究提供了素材和佐证。回忆录和传记的作者以历史的见证人或参加者来说话往往给读者以历史真实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回忆录和传记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全部历史或真正的历史，那就太天真了。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写回忆录和传记。工人和农民就没有办法写。作为人来说，他们的每一个人应该同精英的每一个人有同等的价值。可是如果说毛泽东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说他们愚昧无知。再说，就精英来说，很多人是不被允许写回忆录和传记的。华国锋，陈永贵，毛远新，李纳，汪东兴，张春桥他们能写吗？他们只能带着他们的记忆进入坟墓。

第二，任何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都很可能有错误。就象李志绥的回忆录，在许多学者的帮助下写出来，还被相关人士指出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

第三，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写回忆录和传记的人都说真话。有的人要为自己脸上贴金；有的人要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找藉口；有的人要为自己现在的行为辩护。

第四，每个人都可能有偏见。这些偏见都会影响素材的取舍和对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比如张戎在《鸿》里以张铁生事件为由来批判文革的政策是“四人帮”有意破坏中国教育，并为自己的开后门上大学和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学生辩护。

第五，任何人的回忆和理解都会为特定政治气候和流行的理论思想所左右，用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理论思想来解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理论思想下发生的事，常常会面目全非。

就文革来说，目前最流行的理论思想是权力斗争。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毛泽东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权力斗争和个人控制来解释的。对许多海外学者来说，中共高层发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宫廷内斗。对这种方法来说，中国没有政治、也没有社会。在这种史论里，中国当时的历史包袱和经济困境、国际环境和冷战气氛、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痛苦、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结构、几代人对马列主义和苏联式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信仰、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的形成和演进等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都不值得考虑。

◇ 新的发展和展望

在宫廷内斗和帝王将相史论风靡一时的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在美国的《

知识分子》和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中都不时有些研究文革的新尝试。虽然这些努力不免给人零敲碎打的感觉，但明显的是，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对文革认识的逐渐深刻和复杂化已渐露端倪。

就香港来说，《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的创刊是香港地区海外学者成熟的标志。同时，海外华人电脑网络杂志已有十多种问世。虽然这些杂志还缺乏严谨的学术风格（有的本来就不是学术性的），但它们为海外华人学者提供了辩论的机会和场所。他们的特点是流通快、反应及时、使有兴趣的人能及时地你来我往地争辩。

可惜的是，这些文章的文风和方法还达不到成熟和使人信服的程度。希望假以时日，新一代海外华人学者能跨上西方文革研究的学术讲坛。

□ 原载《明报月刊》1996年第12期（小雨输入）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肖十一（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	<cnd-info@cnd.org>
	周皓生（加拿大）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